

儒法斗争历史的概况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学习参考)

邓小平
胡乔木

一九七四年六月

PDG

D6

200

35519

45

儒法斗争历史的概况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怎么样对儒法斗争做宣传，汲取历史上斗争的经验，我们开始整理了一些东西，还有很多问题也搞不清，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今天主要是汇报一个概况，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一个概况。这中间有好多问题也没有搞得很清楚，也可能还有很多错误的，希望领导同志听了以后，给予指出，提出批评。

汇报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一个是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演变；再一个就是近代史上的儒法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它都是打上一定的阶级烙印的，他们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和法家这两家是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地转变过程中，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间形成的两个对立的学派。儒家的创始人是孔丘。儒，在那时候是一种职业，是那些给奴隶主贵族办丧事的，当吹鼓手的那样一些人，当时就称作儒。孔子在年青的时候，也从事过这个工作。后来，他教学，形成了这么一

个学派，称作儒家。儒家，它是代表了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的，是一个反动的学派。它在当时鼓吹和推行一条反对任何的社会变革，反对一切新生事物，顽固地维护没落的奴隶制这样一条反动的政治思想路线。法家，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进步的学派。因为法家强调法治，讲法，以法来治理国家，后来人们就称它为法家。它宣传和实行一条变革旧制度，发展新制度，反对旧传统，支持新事物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样一条进步的政治思想路线。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当时社会大变动的推动下，文化思想领域里边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除了儒家、法家以外，还有很多家，如墨家、道家……。

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主要的阶级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跟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所以，不管文化思想上有多少家，多少派，就其阶级实质来分析，在世界观上，它不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就是属于奴隶主阶级。儒、法两家的斗争，是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两种社会制度的大搏斗，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抓住了儒法斗争，也就抓住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领域里面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的两种制度的激烈搏斗的时期，是用新制度去推翻旧制度、去代替旧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就集中地表现在儒法两家的斗争。长期以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搞尊儒反法，所以，儒法斗争的历史，以及它的阶级实质都被严重地歪曲了。儒家的反动思想被捧上了天，而法家的进步思想却遭到了排斥、咒骂，得不

到正确的评价。虽然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的思想家也进行过反孔的斗争，批判过儒家，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来深刻的揭露孔丘、儒家的思想的阶级内容和反动本质。我们今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总结和吸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地批判孔孟之道，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肯定，对于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第一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这个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期。这个时期是奴隶制急剧的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以少正卯等为代表的法家的先驱跟孔丘的斗争。少正卯这样一些法家的先驱，他们积极地宣传变革的思想，来为封建制推翻奴隶制制造革命的舆论。而孔丘推行一条顽固地维护没落奴隶制的路线。

第二阶段是战国的初期到中期。这个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地在各个诸侯国家建立起来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进一步夺取封建制的胜利进行斗争；而没落的奴隶主想搞复辟，要复辟奴隶制。所以，反映在政治思想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推行一条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暴力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实行彻底地改革，就是要彻底地推翻奴隶制，用革命的暴力彻底地推翻奴隶制，建立新兴的封建制，这样一条路线。而儒家的代表孟轲，他要搞复辟，搞倒退，鼓吹一套复古倒退的反动理论。在思想战线上，商鞅和孟轲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斗争。

第三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个时期，封建制基本上在各个诸侯国开始建立起来了，封建制要进一步发展，它就要统一。这个时期，就是秦王朝搞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的国

家这样一个过程中，反对那些封建割据势力搞分裂、搞倒退。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边，以荀子、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他们要促进国家的统一，主张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对孔孟的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想，进一步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吕不韦这样一些奴隶主的复辟势力，他们搞分裂、搞复辟的活动进行了斗争。这是我们大致把春秋战国时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制造革命的舆论，第二阶段是进一步进行上层领域的革命，第三阶段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儒法的斗争。

第一阶段，春秋末期，少正卯和以少正卯为代表的法家先驱跟孔丘的斗争。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到春秋时期，就已经走向了腐朽没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当时，奴隶们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奴隶制的统治。奴隶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制度，动摇着奴隶制度。奴隶们的起义斗争，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当时，在奴隶制的统治下，它那种生产方式就叫做井田制。井田制就是由奴隶主的最高头子一层一层的往下封，划成一块一块的井字形的田，分封给一级一级的奴隶主，各级奴隶主，从最高的奴隶主那儿得到土地，而且得到了奴隶，各级奴隶主在一块一块的土地上，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如果他犯了罪，最高奴隶主可以把它剥夺了，当时就称此为奴隶主国家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属于最高奴隶主头子的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下面，奴隶没有任何自由，被固定是某一个奴隶主的奴隶，只能在这一奴隶主下面进行劳动，他生产的一切东西都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按照等级逐级往上纳贡，根据

收入纳贡。到了春秋晚期，奴隶制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奴隶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他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得到一点点，所以大量奴隶逃亡，或者起义反抗。当时，有一些从事工商业、小手工业的，或者从奴隶主比较下层的贵族里面转化出来的人，采取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剥削方式，他们把那些逃亡的奴隶招徕，在他的土地上耕种，采取一种赋税的办法，就是你耕种多少，你可以得多少，有多少要交给我。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跟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不同了。随着奴隶制的没落，这样一种生产关系逐步地发展，有的奴隶主在自己分封的土地上，就是上级奴隶主分封给他的土地以外，另外还开辟了很多荒地，在这些荒地上面，招徕了别人的逃亡的奴隶，在上面耕种，也采取赋税的办法，根据你耕种的土地，一年交纳多少赋税，就叫赋税制。它和奴隶制下面的井田制不一样，这个对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逐步地瓦解了奴隶制度下面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那些奴隶主统治者，由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财政经济上也出现了危机，他拿不到那么多东西，收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从事私田的发展，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地主阶级做为私有，不属于奴隶主头子所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向私田征收东西，征收物品。到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了初税亩，初税亩的出现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私田的出现，不属于奴隶主头子所有。这些土地的占有者可以不向奴隶主交纳赋税。奴隶主头子为了要增加收入，就向私田征税，于是就宣布了初税亩。在奴隶主头子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财政收入；在客观上讲，就标志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这

种私田属于私人所有，在这些私田上面实行的是一种租佃的关系。初税亩的宣布在奴隶主头子来讲，是为了增加他的财政收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危机。这个事件比较重要，标志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得到社会的合法承认。在公元前594年，在鲁国首先开始。这也表明，地主阶级做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历史的发展总是以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革命的变革也总是表现为对旧的势力所崇拜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否定，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随着奴隶起义的高涨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也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到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是岌岌可危了，要垮台了。同时，社会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新事物。在经济上，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赋税制，就是每亩收税。当时还实行很多改革。在奴隶制社会，奴隶平时是生产的劳动力，打仗的时候上前线当兵。在这时，有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在这上面也做了一些改革，像鲁国的季氏搞过一个“作丘甲”。“作丘甲”就是按照田亩财产来纳税、来出兵，这就跟那时的奴隶平时是劳动力，战时被赶上前线打仗的情况有所变化。这样，都是为了要使生产力能够向前发展，生产关系怎样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新兴地主阶级实行赋税制，就是在经济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同时，他们大量地招收那些逃亡的奴隶，做为他们的劳动力，变成他们的佃农，他们使用这些劳动力开辟土地，发展自己的私田。这样的情况，使得新兴的地主阶级经济上的实力逐步的壮大。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私门富于公室。所谓私门，就是这些地主阶级，或是中小奴隶

主转化过来的人。公室就是奴隶主的国家。当时，就出现了地主阶级个人富于国家的财产，就是私门富于公室，就是有些地主阶级，由于经济上的发展，私田大量扩展，在经济实力上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君。这样一种情况，就说明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实力也逐步地超过了奴隶主阶级，这是在经济上面出现的这样一种新的情况，就是赋税制，“初税亩”、“作丘甲”、“作丘赋”，后来秦朝还有“出税禾”等等，都是属于经济制度上的改革，这样一些新的事物。在政治上也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在奴隶们与新兴地主阶级斗争下面，当时有一些国家公布了一些成文法，就是公布了一些法律条文。原来，在奴隶主统治底下，法律是没有成文的，奴隶主怎么说，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让你死你就得死。当时就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罚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讲，那是管不上的，不能管他，“刑不上大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就很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新兴地主阶级都是等级地位比较低的，或者有的原来根本就不是奴隶主，他是小生产者，他在政治上是受压的，那么，他们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也要解放奴隶，因为这个时候，奴隶根本就是在奴隶主操纵下面随意杀戮的，新兴地主阶级他要发展，要解放奴隶，把奴隶解放出来，变成他的佃农，变成他的奴隶。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就跟奴隶主进行斗争，要求公布成文的法律，不能你奴隶主随便说了就算，要公布一些法律，也要限制一下奴隶主贵族的一些特权，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要提高新兴地主阶级的地位。当时，在一些国家，就被迫公布了一些法律条文。像郑国，公布了法律条文，后来，

晋国“铸刑鼎”，就是把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不仅这样，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私法律，邓析就自己做了法律条文，来跟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些东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奴隶制度下面那种等级统治关系，特别是那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贵贱不衍”的等级统治局面，提高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的一步步提高，它对于奴隶制度下面的那些规章制度，就有点瞧不起了。奴隶制的规章制度规定，各等级的生活方式、行动的规范，都有一定的规定的，你穿什么，吃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定的，这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那么，这个时候，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提高、实力的加强，他就要对这些旧的东西不满意了。这些旧的东西当时就叫“礼制”，就是礼的制度，规定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的仪式，穿衣的仪式，舞蹈的仪式，它都有一个规定，一定的等级，有一定的一套规定。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提高以后，它对这些东西就不满意了，它就要打破旧的奴隶制度下面的旧的规章制度对它们的束缚。在当时，这种破坏旧制度的行为叫做“越礼”，或者叫做“僭越”，这是对一种旧的规章制度的破坏。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的势力起来以后，当时，这种情况就很多。像鲁国的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季氏，他就搞“八佾舞于庭”，“八佾”，是一种舞蹈队列仪式，八个人一行，一共八行，八八六十四个人，这种舞蹈的仪式，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而季氏按照他原来的地位，他只是一个大夫，就是天子底下还有诸侯，诸侯底下还有卿，卿底下才是大夫，地位是很低的，他根本就不能够使用这样一个舞蹈仪式。但是这个时候，季氏政治上、

经济上的实力加强以后，他就不管你旧的一套规定，他打破了这一套东西，他也要搞“八佾舞于庭”。他不仅搞“八佾舞于庭”，他还要去祭泰山，祭泰山只能天子才能去祭，季氏也不管，“季氏旅于泰山”嘛，他去祭泰山。所以这样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包括于各种各样制度上新的东西的出现，破坏旧东西的出现，必然要反映在思想意识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动，政治上新的东西，经济上新的东西，对旧的东西要有所打破，所以必然要反映在思想上。当时反映在思想上的，也就出现了宣传变革、发展，反对保守、倒退，宣传要法制，反对礼制，就是要反对、要破坏奴隶制的那样一套理论、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要实行法制。特别宣传要重视“人事”，就是要重视人的努力，反对听从天命，这样一些进步思想。当时，以少正卯等为代表的法家的先驱，他们就是宣传这样一些变革的思想，发展的思想，来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制造舆论。但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们竭力地维护奴隶制度，他们反对社会变革，反对新事物。孔丘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一个代言人，他顽固地坚持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思想路线。所以儒法两家，就是在这样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搏斗中间形成的。儒法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里面的反映。孔丘这个人，他反对一切新事物。正如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里面讲到的，就是在这个孔丘的眼里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孔丘就是那么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反对一切新生事物。当时鲁国的季氏推行赋税制，推行地主阶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孔丘认为这是

违背了周公之典，违背了周公的规章制度（周公是西周奴隶制度的头子）。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进行变革，推行赋税制，孔子甚至于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他说冉求不是他的学生，叛变了他，要他的学生们去围攻冉求，“鸣鼓而攻之”。对于当时晋国铸刑鼎，就是把那些法律条文铸在刑鼎上公布出来，这样一件事情孔丘是极力地加以反对。他说你把刑法一公布出来，大家都有个标准了，大家都可以根据刑鼎来要求了，在这个范围的规定谁不符合，他就要起来跟你算，你不符合这一条，你得遵守这一条。他说这样一来的话，贵贱就没有差别了，“贵贱无序”就是没有这样的等级次序。原来奴隶主说的话，奴隶是不能违背的，你现在把这些法律公布出来，他们也可以指责你奴隶主，说你违背了这一条。他说这样贵贱的次序就打破了。如果贵贱次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还成一个国家吗？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他说晋国铸刑鼎就是要亡国了，不是国家了。他反对这样一个革新的行动。对于少正卯这样一些宣传革新的思想家它更加以反对。他恶狠狠地骂少正卯，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杰雄也”，是小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当他窃据了鲁国司寇摄相职的时候，不久就把少正卯给杀害了。孔丘对新事物极力地加以反对，对旧事物他就要极力加以维护。在他看来，奴隶制度是丝毫不能违背的，更不能有所改变，必须保护它。对这样一些东西他是看不惯的，有一点儿改变他都是看不惯的。季氏的“八佾舞于庭”，这样一件事情，他就叫嚷，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甚至于连一个酒杯的模样稍微有点儿改变也要悲叹。他讲过这样的话：“觚不觚，觚哉，觚哉！”

就是说酒杯不像酒杯，还叫什么酒杯呀！所以他是旧的东西极力的维护，他维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的那套统治制度——周礼，他维护的就是周礼，他极力地赞美周礼，说周礼“郁郁乎文哉”，就是说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好，非常的完美，要维护它。他的反动的政治纲领就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这个周礼。“克己”就是要人们安分守己进行自我修养，就是要消灭一切违背奴隶制的思想和行为。“复礼”就是要全面地恢复奴隶制的等级统治秩序，永远保持奴隶制的统治关系，而且还要把已经没落了的和已经被打倒了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这就是他的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样一套反动的东西。他为了达到这样一个反动的政治目的，实现他的这样一条反动的政治纲领，他炮制了一整套的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仁”的标准，他很明确，他说每个人都要做到“仁人”，成为一个“仁人”。“仁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仁人”的标准就是“克己复礼”，就是要达到实现他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他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这就是说“仁”的标准，一个人一定要做个“仁人”，每个人必须要做一个“仁人”。这“仁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具体地来讲，应该怎么做呢？你在看东西、听东西、说什么、做什么，这些方面都不能违背礼，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看、听、说、动，都不能违背礼的，违背礼的你都不要去做，一切都要遵守这个礼。一个人除了看、听、说、做，还有什么呢？没有了，都包括了，反正你的一举一动都不准

违背这个礼。他那个“仁”，政治上就是宣扬所谓的“德治”，就是要用“德”治理，反对用刑，反对用法。他这一套所谓的“德政”，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欺骗。更重要的，他是为了要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的暴力起来推翻奴隶制。他说，用革命暴力就是不“仁”，就不是实行“德制”这样一个原则，你这个是不行的。他鼓吹“德政”，就是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跟奴隶们使用暴力。他所讲的“仁”，包括所谓的“忠恕”、“爱人”这样一些道德品质。这样一些道德品质，都是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品质，其实质并不是要你对老百姓，对奴隶实行“爱人”、“忠恕”的原则，而是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实行“忠恕”、“爱人”的原则。要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加强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团结，来共同对付奴隶的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他整个这套“仁”，就是为了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革命。你要造反，你要造这些奴隶主的反，他就说你是“不仁”给你加上“不仁”的罪名，来进行残酷的镇压。孔丘他还鼓吹一整套的“中庸之道”，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理论。还宣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这样一种“天命观”，就是说，一切都要听天的安排，人是无能为力的。还宣扬“生而知之”这样一套“天才论”。他这些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都是为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来做论证的。他为了维护这个旧制度，开历史的倒车，他还到处去游说，寻找反动的组织，勾结各种反动的势力，而且还是大搞阴谋诡计，耍反革命的两面派伎俩。他有时也搞“小忍”，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他的“大谋”，他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小忍”，暂时的忍耐，完全是为了要复辟奴

隶制的“大谋”。他口里边讲的是“仁义”，手里边却干的屠杀革新派的刽子手勾当。他一上台马上就把少正卯给杀了。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骂他是鲁国的“巧伪人”，这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孔丘两面派的面目。孔老二这个人一生是逆革命的历史潮流而动的，他到处碰壁，最后落得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狗的可耻下场。这是一切妄图开倒车的反动派的必要的结局。当时以少正卯等为代表的法家”他们批判了孔丘这样一些反动的思想，当时一些法家的先驱，他们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大造革命的舆论，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潮。少正卯是这中间一个主要的代表，其他还有一些，简单介绍几个。一个是郑国的邓析。邓析这个人看来他宣扬变革的发展思想，他是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作了一部“竹刑”，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他那个“竹刑”是专门针对奴隶主统治者的那些法律条文的。据历史上的记载，当时邓析作“竹刑”就是专门反对奴隶主统治者搞的那套刑法。邓析还专门为那些地位比较低，但是在经济上已经发展起来的那些新兴地主阶级来打官司，看来他是一个律师的祖师爷，他比较早。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经济上力量很强，但是在政治上地位很低，有时跟奴隶主发生矛盾，往往政治上就要倒霉，就要被抓起来。邓析就要专门为他们辩护，跟奴隶主统治者进行斗争。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比较大的案件，他去跟奴隶主统治者进行辩论，当时人就给他一件衣服，比较小的就给他一条裤子，做为打官司的钱。这个当时很盛。他为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这样一些人跟奴隶主统治者做斗争，他通过这个来鼓动人民起来跟奴隶主贵族做斗争。他用“竹刑”否定奴隶主阶级的那些是非。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有的故事不怎么太集

中地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但它表明邓析是跟奴隶主贵族专门做对的。另外根据记载，邓析他那一派人还宣扬这样一种思想，“山与渊平”，高山跟深渊一般平，宣扬这样一种思想。他当时为什么要宣扬这样一种思想呢？因为那些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护他的等级统治，总是宣扬“天尊地卑”的思想，就是说天总是高的，地总是低的，高低是不能改变的，等级制度也是不能改变的。那么邓析宣扬“山与渊平”的思想，就是说，高低并不是不能变的，是能起变化的。你看高山跟深渊，它可以一样平。这是宣扬一种变的思想，反对奴隶主统治者那种“天尊地卑”的“不变”思想。另外还有晋国的史墨。当时有那么一件事，就是在公元前五百一十年，鲁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季氏，把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赶跑了，不仅赶跑了，以后鲁昭公没有再能够回到鲁国，死在外面。当时孔丘对这件事很伤心，认为这个事情简直不像话，君不君，臣不臣，臣都把君给赶跑了，而且死在外面，也不让他回来，死了以后连他的尸体都不让回来。对于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晋国的一个贵族赵简子问史墨，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史墨对这件事做了分析。史墨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世世代代，他的政治已经是很腐败了，而季氏世世代代努力地搞好政治，所以他说鲁国的老百姓都忘掉了他的君主，虽然这个君主死在外面，也没有人去同情他，可怜他，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亦然。”社稷就是代表国家的政权，“社稷无常奉”，就是国家的政权不是永远掌握在某一个阶级的手里的；“君臣无常位”，就是说，君臣的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自古亦然”，就是说，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

发展的，变化的，你鲁君还是死守着老的一套，奴隶主的那一套，那是不行的。季氏搞新的一套，发展新的封建制度，他就可以改变他那个地位。而且他还引用了“诗经”里边的一句话来论证他的思想。“诗经”里边的话跟“山与渊平”这个思想差不多，“诗经”里边的话是这样讲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岸就是那些小丘陵，高岸，不是很高的山，一般的小丘陵。“高岸为谷”就是高岸它可以变为深谷。“深谷为陵”就是深谷也能变成丘陵。这就是说，上下要不断变化的，自然界的发展是一个正常的规律。这些变化、发展的思想都是当时社会新生事物否定旧事物的过程中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边的反映。特别是史墨回答的这一段话，跟他引用“诗经”里边的话来证明就很清楚。就是鲁国的新旧两种势力的交替、变化，反映在思想里边，他感觉到这是一种发展的，变化的，是不足为奇的，是合乎客观的规律的。关于少正卯的思想，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材料了，很难找到他的材料了，但是我们从孔丘在杀害他的时候给他加的五条罪状来看。孔丘给他加的罪状。我们从反面来看。关于这五条罪状，也有很多解释。主要是赵纪彬同志有个解释，杨荣国同志也有个解释，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赵纪彬同志的解释。杨荣国同志的解释比较好看，他那个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对五条有个解释，概括的比较简单。赵纪彬同志讲的比较多，每一条都有很多的考证，这里归纳一下，供大家参考，可以跟杨荣国同志的对照起来看。讲到少正卯的思想，从加给他的五条罪状中，我们从反面来进行分析。第一条就讲“心达而险”，就是说他在思想上主张以地主阶级的利益来掌握政权，改造社会。第二条讲